

## 一、前言

以演唱會形式進行政治社會性的教育與動員，無論在台灣或國外的社會運動場合中，已是一種十分普遍的行動，也吸引了學術界的研究興趣，基本上，1990年代以來，文化行動主義(cultural activism)取向的音樂社會學研究時常關心的基本問題是：音樂在社會運動中扮演怎樣的角色？音樂行動如何與社會運動進行結合？又產生哪些政治或文化上的影響？（楊建章、呂心純 2010；Eyerman 2002；Eyerman and Jamison 1998；Rosenthal 2001）？「運動中的音樂」(music in movement)除了蘊含政治社會動員效果，其組織過程與表演形式亦可能反映出音樂行動者所跨出之公共參與圖像，而藉由音樂所形構出來的互動空間(interactive space of engagement)以及「演唱會中的行動」(acting in concert)，有可能挑戰著既有的支配性文化與霸權，在理解音樂與社會運動的關係時，更是除了歌曲、歌詞分析外，值得文化研究者關注的向度。

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一種特殊的音樂場景(music scene)，結合政治社會運動議題的「議題動員取向演唱會」(issue-mobilization oriented concert, IMOC)，提供了一個探索音樂與社會運動關係的切入關懷視角。

國外值得參考的案例如 John Street 等以英國的 RAR(Rock Against Racism)和 Live 8 這兩個系列演唱會為研究案例，探討結合社會運動議題之不同演唱會形式，及其操演模式所可能產生之公共性(publicity)與政治效果的差異，他們分析演唱會籌辦的政治經濟脈絡、組織過程、現場表演、所形成的動員形態及文化介入效果等等(Street, Hague, and Savigny 2008)。從音樂場域的社會建構視角來看，台灣近 10 年來亦有愈來愈多的政治社會議題與演唱會結合的現象，<sup>1</sup>我們認為此種現象在台灣

---

<sup>1</sup> 除了本研究探討的「正義無敵」和「音樂·生命·大樹下」兩個演唱會系列外，還有如 2007 年 8 月黑手那卡西「怎麼辦」演唱會、2008 年 3 月台北「24 小時送

本土的脈絡下，很值得探討，然而目前台灣的相關研究幾乎沒有，本研究希望就演唱會作為社會動員策略之文化經驗與行動意涵，提出一些初步的經驗觀察與分析，以期拋磚引玉，作為後續研究的基礎。

本研究以台灣具代表性的 2007 年「正義無敵」及 2005 年「音樂·生命·大樹下」兩個演唱會的空間社會過程為例，探索籌辦演唱會的行動者如何藉由演唱會的形式進行組織動員？如何可能在演唱會的展演與體驗過程中對參與者產生培力作用？以下篇幅首先透過文獻梳理，建立本研究基本的分析架構，之後是對這兩個演唱會的經驗探討，我們將探索演唱會的組織者如何將其自身對音樂美學與公共行動的想像，鑲嵌於演唱會的組織、論述與展演過程中；其次，我們將探討參與的群眾如何和演唱會展演產生互動，並藉此進一步考察演唱會整體呈現的音樂場景形貌。我們希望藉由上述的分析，思索演唱會作為運用文化資源之組織行動，其論述策略和展演方式，如何透過音樂場景中各個行動者的互動過程，達到影響集體行動的政治效果，最後則在經驗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一些尚待完善的觀念建構方向。

## 二、音樂與社會運動之關係性初探

音樂社會學者近來的理論取向，不再僅將討論著重於文化工業與文化霸權的支配向度，唱片工業的確會影響音樂文化的發展方向，但這個影響並非決定性的，許多研究者係以社會建構論為基本出發點，強調音

---

愛到西藏」演唱會、2009 年 4 月雲林「八色鳥叫春——反勾丫、權演唱會」、2009 年 7 月台北「自由圖博音樂節」、「西藏自由音樂會」、2010 年 8 月貢寮反核「諾努客音樂會」、2011 年 6 月黑手那卡西「就這麼辦！邊緣翻騰、人民力量」音樂會、2012 年 3 月台北「王家大鋸院」、2012 年 6 月彰化溪州「保護水圳音樂會」、2012 年 7 月台東反美麗灣「沙灘、海洋、Fudafudak——永遠的天堂」音樂會、2012 年 8 月台北「核電歸零音樂會」、2013 年 2 月台北「聽見·華光」音樂會、2013 年 3 月樂生療養院「重返大樹下」音樂會、2013 年 4 月台北「台灣反核——Kraftwerk 3D 演唱會」、2013 年 8 月苗栗「0816 拆政府·守護苗栗音樂晚會」等等。